

美日同盟“轴心化”及其影响

樊小菊

[内容提要] 美日同盟本是基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形成的同盟关系，其后逐渐演变成美国维持亚太霸权的工具。当前美日同盟正在加速实现“轴心化”，其主要内容一是美日军事一体化，二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推进盟友体系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网格化”。美日同盟“轴心化”既是出于美国实现在亚太永久驻军以维系其霸权的战略利益需要，也反映出日本借机提升国际地位，获取实际利益的现实算计。这一趋势不仅带来美日两国关系、同盟功能等的调整，也使得日本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和作用出现显著变化，对地区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美日同盟 轴心化 亚太霸权 地区安全

[作者介绍] 樊小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日本问题和东北亚安全。

2024年以来，以美日两国为核心的外交、安全多边议程密集展开。4月，美日菲在华盛顿首次召开峰会。7月底，美国及其盟国、伙伴国之间的几场重要外交安全会议在东京举行：美日外交安全“2+2”会议、美日韩防长会议、美日澳印外长会议，其间还套开了美日、日澳、日印外长会议，以及美日、日韩防长会议。日本方面公布的信息显示，居于系列会议中心的美日两国在“2+2”会谈中再次确认，“美日同盟在深化和扩大与澳、韩、菲、东盟、太平洋岛国、北约等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多边合作中处于核心地位”。^①11月，美

^①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日米「2+2」）（概要）』、日本外務省、2024年7月2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it_000001_00943.html。

日澳召开防长会，同意建立“联合防卫机制”。^①这些事件表明，美日同盟正基于军事一体化打造美国盟伴体系的“轴心”，继而整合美国的全球盟友，将外交、军事资源汇集到西太平洋地区，以巩固美国的霸权。美日同盟的性质、功能都随之发生了嬗变，并将对地区和国际形势带来深刻影响。

一、一体化的美日同盟正成为美国亚太霸权体系的轴心

2024年4月4日，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会晤美国总统拜登的前4天，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推出第六份“阿米蒂奇—奈报告”。^②该报告以“面向一体化的同盟”为主题，提出了美日同盟发展军事一体化、扩大盟伴体系和强化经济和科技合作等三条实现同盟一体化的具体路径。^③几天后，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岸田与拜登会谈，明确要“升级”美日同盟，重点强化同盟的“战力态势”，实现“作战和能力的无缝统合”，并强化构筑与“志同道合”国家及组织的关系，以及经济安全保障合作。^④可以看出，“阿米蒂奇—奈”报告的建议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表明美日同盟的一体化是当前美日两国政策精英共同谋划的结果，而非一届政府的临时性安排。以一体化的美日同盟为中心，联合美国的其他盟友，共同构筑所谓“一体化威慑”是美日两国当下正在实施的地区和国际战略。

（一）美日同盟“升级”的核心是实现军事一体化。岸田访美前夕，英国《金融时报》网站透露，两国政府将对美日防卫关系进行1960年“安全保障

① 「2024年11月日米豪防衛相会谈共同声明」、[日]防衛省、2024年11月17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mpo/2024/1117b_usa_au-j.html。

② 2000年，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召集跨党派小组，着眼美国总统选举研究美日同盟的发展愿景并形成报告，以便为新政府提供参考。此后，两人多次牵头编写类似报告，因其政策建议在美日两国维护和发展同盟关系中具有显著的政策指导和舆论引导意义，被称为“阿米蒂奇—奈报告”。2000年后，相继于2007年、2012年、2018年、2020年和2024年推出共六份报告。

③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2024: Toward an Integrated Allianc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4,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japan-alliance-2024-toward-integrated-alliance>。

④ 「日米首脑共同声明」、日本外務省、2024年4月10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652148.pdf>。

条约”修订以来最大幅度的“升级”。^①4月的“阿米蒂奇—奈报告”和美日首脑会谈联合声明表明，“升级”的核心是美日军事一体化。具体看，“一体化”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升级同盟的“指挥和控制”；二是促进美日防卫装备开发、生产、维护方面的合作，并为此新设定期协商机制；三是强化跨领域作战，加强日本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之间在人工智能、网络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其中，升级同盟的“指挥和控制”是同盟“升级”核心中的核心，有评论称之为“美日联合作战的具体化”。^②

所谓升级同盟的“指挥和控制”，就是驻日美军和自卫队之间指挥控制权的一体化。具体而言，驻日美军将重整指挥系统，成立隶属于美军“印太司令部”的联合军司令部（JFHQ），与日本自卫队将要设立的联合作战司令部（JJOC）对接，实现从平时到战时的统一指挥协调。^③迄今为止，驻日美军司令部并没有作战指挥权，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基地和部队的管理，驻日美军的作战指挥权由位于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掌握。例如，总部位于横须贺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和驻扎在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其指挥权都归夏威夷。整合后的联合军司令部将从“印太司令部”获得作战和训练指挥权，一方面可以减少距离、时差等带来的不便，另一方面旨在强化与日本自卫队之间的沟通协调，实现双方作战指挥权的“一体化”。

从日本方面来看，为了升级同盟的“指挥和控制”，也将进行自卫队历史上最大的组织体系改革。5月10日，日本参议院通过“自卫队法修正案”，明确将新设一元化指挥海、陆、空自卫队的常设机构——联合作战司令部，其首长为联合作战司令官，与各自卫队参谋长级别相当。联合作战司令部

^① “US and Japan Plan Biggest Upgrade to Security Pact in Over 60 Years,” *Financial Times*, April 6,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df99994d-ec4b-4c3c-9c42-738ec9b338d0>.

^② 「岸田首相の国賓訪米を総括する5つの視点」、日経ビジネス、2024年4月15日、<https://business.nikkei.com/atcl/seminar/19/00023/041500422/>。

^③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8, 2024,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2-2/>.

将设在防卫省内，编制240名；除了负责统一指挥海陆空及网络、太空等自卫队各兵种之外，联合作战司令官还将担负与驻日美军联合军司令部进行协调沟通的“窗口”职责，以提升“各自部队的指挥和控制”。^①此前，从法律规定来看，日本自卫队的联合参谋部长仅有给防相当参谋的职权，而没有对部队的指挥权。但在实践中，联合参谋部长既负责制定作战方案、辅佐首相和防相，又负责根据首相和防相的指令指挥部队“出动”。^②今后，指挥部队作战的任务将交由自卫队联合作战司令部承担。

上述美日两国的制度调整使美日同盟向着军事一体化发展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从美日双方的说明来看，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的“一体化”指挥并没有谁主谁从的规定，日本政府也一再表示，自卫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并不从属于美军的指挥和控制。^③不过，正如多家日本媒体所言，由于美国的军事和情报收集能力具有压倒性优势，美日升级同盟“指挥和控制”，将意味着美国实质上掌握了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权。实际上，与驻韩美军不同，驻日美军与日本自卫队之间并没有联合司令部，各自拥有独立指挥体系。而对于美国来说，掌握自卫队的实际指挥权将使日本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维护美国霸权力量的重要战略步骤。日本政府人士透露，驻日美军调整指挥控制权是作为日本增强防卫能力的“对价”，由日方向美国提出的要求，^④也就是说美国要求日本增强防卫能力，而日本要求驻日美军调整指挥控制权，看似是美日间的“平等交易”。然而从更详细的报道来看，日本方面向美国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希望将驻日美军司令官提升至上将级别，^⑤并且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美方回应。考虑到前述第六份“阿米蒂

① 『自衛隊を一元的に指揮「統合作戦司令部」設置 改正法が成立』、NHK News、2024年5月10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40510/k10014445391000.html>。

② 福好昌治、「深化する日米同盟指揮統制機能」、『軍事研究』、2024年8月。

③ 「日米、東アジアで即応態勢」、『日本経済新聞』（朝刊）、2024年4月12日。

④ 「日米、東アジアで即応態勢」、『日本経済新聞』（朝刊）、2024年4月12日。

⑤ 「統合軍司令部に格上げ、賢明な動き 日米2+2 ザッククーパー氏」、『朝日新聞』、2024年7月29日（朝刊）。

奇—奈报告”已将重构美日同盟的“指挥和控制”放在首位，说明实现驻日美军和自卫队之间的“一体化”指挥是出于美方对同盟发展方向的考虑。这反映出美国方面把日本自卫队纳入麾下、使日本军力为美所用的意图，而当前美日同盟的军事一体化正是在朝着这一方向落实美方的战略设计。

(二)“美日+”机制的扩大化使美日同盟成为美国亚太盟友体系的中心。在过去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设计中，美国居于中心位置，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的双边同盟关系则是从中心向周边辐射的“条辐”，从而形成类似车轮的“轴辐”体系(hub and spokes)。有学者指出，美国是通过“紧密的双边主义”强化对各盟国的控制，从而在地区形成非正式的“等级制”。^①尽管美国一直将美日同盟定义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同盟关系，但美日同盟与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同盟关系之间并没有相互交叉的合作关系。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提出了“网格化”(lattice-work)的同盟体系新构想，推动美国“印太”地区盟伴之间的合作，以形成“集体制衡”。^②在同盟“网格化”的推进过程中，随着美日韩、美日菲、美日澳、美日澳印(QUAD)等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强化，美日同盟处于“网格”中央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凸显。围绕美日同盟这一“轴心”，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正在加速整合。在此基础上，美国还试图推动其亚太盟伴体系与大西洋同盟体系之间进一步加深关联、相互策应。

2024年8月5日，《华盛顿邮报》网站刊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联合署名的文章《拜登的印太外交让美国的未来更安全》，对拜登政府留下的“印太”外交遗产进行了整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变“轴辐”同盟体系为“一体化、相互联结的盟伴网络”。

^① Victor Cha, “Informal Hierarchy in Asia: The Origins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ume 17, Issue 1, January 2017.

^② Tom Corben, Peter K. Lee, and Fancy Footwork, “Biden’s Two-Step Approach to Indo-Pacific Allies,” *The Diplomat*, March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3/fancy-footwork-bidens-two-step-approach-to-indo-pacific-allies/>.

其中，强化美日韩、美日菲和美日澳印合作是拜登政府自视的几大外交“杰作”。^①2023年8月，拜登在戴维营总统庄园第一次单独召开美日韩峰会，发表名为《戴维营精神》的联合声明，承诺“迅速相互协商，协调应对影响三国集体利益和安全的地区挑战、挑衅和威胁”。^②峰会还就加强三国各领域合作进行制度化安排，有评论敏锐地指出，美日韩合作整合新机制就是“在美日韩三国战略资源数量和素质不变的前提下，变分散使用为集约布局，实现军事力量倍增及乘数效应，从而推进美日韩形成全面合作的准同盟机制。”^③

2024年4月，美日菲在华盛顿首次召开峰会，成为“美日+”合作机制的标志性成果。如果说在美日韩合作中，日本和韩国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美日同盟的中心地位并不突出，那么在美日菲合作中则明显是美日两国处于上位，而菲律宾作为被援助、被拉拢、被利用的对象，其被动性和不平等地位十分显著。从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来看，三方并不是朝着协商互助的准同盟方向发展，而是更多强调美国和日本对菲律宾的援助和支持，以及鼓励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韩国等美国的其他地区盟友加强合作。^④考虑到日本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地区长期发展起来的密切联系，日本的影响力可以通过“美日+”的方式整合到美国的战略设计中，而日本也得以借助“美日+”合作模式加大对地区安全的介入力度。

美日韩和美日菲合作的机制化，加上已有的美日澳和美日澳印对话和合作机制，美国在“印太”的盟伴体系正在以美日同盟为轴心加速整合。此外，随着美日英合作的推进以及日本逐步参与AUKUS合作，更多的“美日

① Antony Blinken, Lloyd Austin, and Jake Sullivan, “Biden’s Indo-Pacific Diplomacy Has Made America’s Future More Secure,”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5, 2024.

② “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 August 1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the-spirit-of-camp-david-joint-statement-of-japan-the-republic-of-korea-and-the-united-states/>.

③ 陆忠伟：《美日韩关系“北约化” 遗祸东北亚》，《东北亚学刊》，2024年第1期，第4页。

④ “Joint Vision Statement from the Leaders of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 April 11,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4/11/joint-vision-statement-from-the-leaders-of-japan-the-philippines-and-the-united-states/>.

+”小多边机制正在成型，并且其触角开始伸向亚太之外。

（三）美日同盟“轴心化”的战略指向是遏制中国。不管是美日同盟的“升级”，还是“美日+”机制的扩散，都能看出明显的遏制中国意图。美日军事一体化的前提是战略目标一体化。2022年10月出台的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为“唯一有能力、有意愿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将“竞赢中国”作为首要战略目标。^①同年底日本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则把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②美日两国在国家战略层面对中国的定位高度一致。对比2013年版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日本对国际安全环境的描述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中国安全动向的描述变化尤其大。2024年的美日“2+2”会谈中，两国就地区安全形势达成5项共识，其中3项是针对中国，且措辞严厉，一致将中国定义为地区“最大战略挑战”。^③

从美日同盟的发展演变历史来看，冷战结束使美日同盟失去了苏联这一共同敌人，面临“同盟意义何在”的合法性、合理性质疑。然而美国不仅需要日本保留驻军，还进一步希望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替美国分担维护霸权的成本。而日本方面对于强化美日同盟、甚至保留驻日美军则一直都有抵抗和反对的声音，在民间尤其突出。这种情况直到2010年前后，由于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尤其是中日关系因为领土争端急剧恶化，日本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而对美日同盟的安全需求上升，国内反基地、反战呼声随之下降。美日两国找到了调整同盟的“最大公约数”。有评论认为，过去60年美日双方的目标往往不一样、甚至相互冲突，但现在美国和日本是地区的两大现状维持国，两国的利益受到来自崛起的新兴力量的挑战也将最大，这意味着美国和日本在面对中国时具有相似的利益。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②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 令和4年12月」、<https://www.cas.go.jp/jp/siryoku/221216anzenhoshounss-j.pdf>。

^③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日米「2+2」）（概要）』、日本外務省、2024年7月2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it_000001_00943.html。

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美国的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起草者为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因此又被称为“奈报告”。该报告强调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驻军以及强化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奈报告”出台6年后的2001年,作者在回顾当时美国的战略选择时表示,美国有一个政策选项就是“创建一个遏制中国的联盟”,但作者认为当时实施这一选项的条件尚不具备,理由之一是“中国的邻国并没有把中国当成冷战时期苏联那样的威胁”,因此,即便美国想要构建这样的联盟也做不到。^①实际上,美国当时也并没有把中国视为全球性挑战,因此也并未将遏制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目标。而到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明确提出了以“全政府”方式应对来自中国的所谓经济挑战、价值观挑战和安全挑战。拜登政府同样视中国为战略挑战,并且美国两党在遏制中国上达成了基本共识。同时,在中日间围绕历史认识、领土等的争端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背景下,日本的对华认识也变得更加负面,甚至向着敌视中国的方向发展。这就使得美国构建遏华联盟的意图和条件都完全具备,并将美日同盟一体化、轴心化的目标指向遏制中国。

二、美日同盟“轴心化”的深层动因

尽管美日两国都面临国内政局的变动,但美日同盟关系的“轴心化”并非一时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双方的战略考量和现实利益盘算,只要双方尤其是美方战略不出现颠覆性变化或重大调整,“轴心化”的趋势仍将延续。

(一) 实现亚太驻军永久化以维护霸权这一美国根本战略利益的需要。二战后以来,美国以军事结盟的方式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驻军,并依靠

^① Joseph S. Nye, “The ‘Nye Report’: Six Years La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ume 1, 2001, p. 97.

驻军掌控驻在国家和地区局势。就美日同盟而言,1960年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第六条规定:“为了日本的安全和维护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陆军、空军和海军将被允许使用日本境内的设施和地区。”^①但美国对于驻日美军的考虑实际上更多基于其亚太战略,而不是主要为了确保日本安全。有日本研究者从美国方面的解密文件中发现,美国内部曾在20世纪70年代明确指出,“驻日美军不是为了防卫日本本土驻留日本,而是为了战略性防卫韩国、东南亚等地”,驻日美军存在的意义一是东亚防卫,二是作为“兵站”。这与日本方面对美日同盟的理解有着明显差异,因此美国方面对美日同盟的真实定位对日本产生了较大心理冲击。^②从冷战结束后美国方面一直推动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也可以看出,对美国来说,驻日美军的存在不是为了“保护日本”,而是为了发挥日本“兵站”的功能维持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从而确保美国对地区安全的主导。1995年的“奈报告”就提出,要在东亚地区维持大约10万美国兵力。^③虽然之后美国驻军在地理分布上有所调整,但这一驻军规模在此后数十年一直得到保持,因为美国认为这关系到其在东亚地区的根本战略利益。

随着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和调整,除了维持驻日美军,美国对驻在国军队的指挥、掌控需求也在上升。与驻韩美军不同,驻日美军从明面上看并不拥有对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权,至少没有公开的条约或协定予以确认。随着美国强化对中、俄所谓“威慑”战略的升级,将自卫队军力置于麾下、服务美国战略利益,提升美方“威慑力”成为美国重要目标。尤其是在自卫队已经将西南方向作为重点部署区域,并且日本政府不断增加防卫开支、发展进攻性武力的前提下,美国掌控自卫队的愿望更加迫切。掌控盟友兵力为己所用

① 「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相互協力及び安全保障条約」、日本外務省网站、<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pdfs/jyoyaku.pdf>。

② [日] 春名幹男、「仮面の日米同盟 米外交機密文書が明らかなる真実」、株式会社文藝春秋、2015年、46頁。

③ “The World and Japan,” Database (Project Leader: TANAKA Akihiko), <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JPUS/19950227.O1E.html>。

的逻辑在美国对韩、对日的安全合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一方面，尽管韩国一直试图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美国方面表面上也予以正面回应，但往往以条件尚不具备为由，设置了长期的评估程序，导致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遥遥无期；另一方面，美国努力试图掌握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权，所谓美日同盟的军事一体化，实际上就是美国掌控自卫队指挥权的另一种说法。同时，美国还试图通过强化美日韩三边军事安全合作，实现日、韩两国的军事安全从战略到战术都与美国同调、同步。

实际上，日本国内对于美军的长期驻留并且保有“治外法权”的特殊地位一直有抵制和反抗。有评论认为，日本向美国提供部分领土用于驻军，并且承认美军的“治外法权”，实际是牺牲“主权和人权”以换取“和平与安全”。^①这成为美国担心美日同盟出现动摇、从而影响美国在日驻军的重要原因。对于美国而言，如果日本民众更多关心“主权和人权”，就会导致日本更加希望摆脱美国的占领；而如果日本民众更多关心“和平与安全”，那么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就会得到日本国内更多的支持。当前，在乌克兰危机等背景下，日本国内舆论对国际安全环境空前紧张，这对美国推行强化同盟的战略提供了绝好时机。因此，美国一方面推动美日军事一体化，将美日两国军事高度捆绑，使日本将“和平与安全”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从而确保日本从民众到政治精英持续支持美国在日驻军。另一方面，美国通过赋予美日同盟在美国盟友体系中的轴心作用，满足日本方面对于提升国际地位，实现更加对等的美日关系的要求，降低日本国内对于同盟中“主权和人权”的关心。如此一来，美军驻留日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都将得到提升，可望实现驻军永久化。

（二）日本提升国际地位的战略考量和获取实际利益的精心算计。美日同盟对于日本而言是二战后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冷战结束后，日本是选择摆

^① [日] 柳澤協二、「米軍犯罪二怒りを忘れた日本人」、『月刊日本』、2024年9月、52頁。

脱美国控制、寻求更加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道路，还是选择更好地利用美日同盟、实现日本利益最大化，这一看似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选择，在日本政界、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中一直有着长期讨论和争议。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前者正在逐渐式微，而后者则日益占据上风，成为政治精英群体的主流共识，并逐步体现在日本的政策实践中。尤其是在前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日本加速走上了以强化美日同盟为前提，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提升国际地位、寻求现实利益的“亲美保守”路线。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也不再强调对美自主、与美对等，而是采取重视美日同盟的现实主义路线。

从战略层面看，恢复大国名誉和大国地位是日本保守政治精英的长期追求，不管是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提出的“摆脱战后体制”，还是安倍第二次执政时期提出的“战后外交总决算”，其基本指向都是努力摆脱战败国身份，寻求成为主导国际秩序的“列强”之一。21世纪国际战略环境的剧烈变化使日本战略界看到了历史性机遇。特别是美国加大力度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实施遏制，而美国的力量受到中东局势等的牵制，这被日本视为“恢复名誉”的好时机。正如有代表性的日本战略界人士指出，日本应继续高举“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旗帜，站在“维持现状阵营”一边，展现出与拒绝“普世价值”的“改变现状阵营”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恢复“失去的名誉”，即扭转“战败”的不名誉。^①实际上，从安倍、菅和岸田几届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来看，主动塑造、推动“阵营化”对抗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所谓“民主安全菱形”“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等理念的提出为代表，日本在复兴地缘政治、加大对华战略围堵上，有时甚至走在美国前面，反映出日本借助国际战略环境变化，寻求改变现状、“转败为胜”的主动战略追

① [日] 宫家邦彦、「菅外交の成否を決する『天地人』」、VOICE、2020年11月、50頁。

求。不仅如此,如果将对抗结构的国际秩序固定化,那么日本对于美国的价值也将上升。对于日本而言,构筑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提升了日本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地位,是其“大国地位”的具体体现。

从现实利益层面看,美日军事一体化使得日本处于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最前沿,意味着日本将承担更多的安全风险,客观上并不符合日本的安全利益。但日本仍然选择加速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自民党“大佬”麻生太郎甚至称,日本处于中美对立的最前线,要有“战斗的觉悟”,而其发表演讲的地点是在台湾地区。^①过去日本对于卷入美国引起的纷争一向保持警惕,但近年却在台海局势上表现异常活跃,所谓“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论调大行其道,日本政府完全不顾以往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的承诺,这很难不让人联想美日之间背后可能存在的利益交换。事实上,2021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两国时隔52年首次在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湾问题。^②此举表明,日本开始公开呼应、附和美国的对华策略,即利用台湾问题牵制、遏制中国,这反映出日本部分政治精英对华心态的变化,同时也表明日本接受了美国方面的要求。在此之前的2021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围绕钓鱼岛问题就曾出现“失言”,先是表明“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后又“纠正”,表示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政策“没有变化”。^③美国这一表态上的反复受到日方格外关注,也是在向日本提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对于日本至关重要。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一贯态度强硬,否认存在领土争议并拒绝与中方谈判解决问题,因此,日本反复向美国要求对钓鱼岛做出安保承诺,试图借助美国力量谋求在中日领土问题上占据优势。从日本的内在需求看,美国对

① 「麻生太郎副総裁、台湾で講演 中国念頭に『戦う覚悟』を強調」、『毎日新聞』、2023年8月8日。

② 「日米首脳、対中で足並み 共同声明に『台湾』半世紀ぶり」、『朝日新聞』、2021年4月17日。

③ 「米国『尖閣の主権』めぐり揺れた表現 対中姿勢の反映か」、《朝日新闻》网站,2021年3月5日、<https://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P3432YTP31UHBI003.html>。

于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支持，可能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顺应美国要求，与美国实施军事一体化的“对价”。

（三）国际环境变化催生美日同盟“轴心化”。美日军事一体化以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展进攻性武力为前提。对于日本而言，满足上述前提的最大障碍是国内的反战呼声。2015年安倍政府修改“安保法制”、解禁集体自卫权时，日本国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到2022年底，岸田政府推出新“安保三文件”、公开发展进攻性武力并容许自卫队进行先发制人打击时，日本国内却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反对活动，这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日本的安全环境、美日同盟的作用，以及对日本防卫政策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近年来，美国加大对华遏制、打压力度，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形势越来越紧张。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政府将地区安全形势紧张归咎于中国的实力增长和所谓的“威压”行为，《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等政府文件对中国和地区形势的描述一年比一年严峻，造成日本社会对华认识越来越负面，对于国际安全环境的担忧不断上升。这就强化了日本社会对于加强美日同盟以应对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的认知。例如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就职演说中称，当前日本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为战后以来最严峻”。^①

另一方面，2022年初发生的乌克兰危机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民众对于安全环境严峻性的认识空前上升。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追随美欧，对俄罗斯采取严厉制裁，引起俄方反弹和报复性措施，加剧了日本民众紧张心理。同时，乌克兰危机延宕，造成日本粮食、能源等价格上涨，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也使日本民众切身感受到国际形势恶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客观上对安全的关心和“不安”心理均显著上涨。2022年11月日本

^① 「石破首相の就任会見（要旨）」、『朝日新聞』、2024年10月2日（朝刊）。

“新闻通信调查会”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乌克兰危机“关心”的回答比例高达88.4%。^①对于安全环境严峻性的认知与对于美日同盟重要性的认知之间有着高度相关性。日本内阁府每5年举行一次关于国民防卫意识的民意调查,2018年3月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美日安保条约有助于日本和平的受访者比例为77.5%,而到2022年11月,这一数据上升到89.7%。^②两次调查之间的最大变化有二,一个是美国政府的更迭,另一个就是俄乌冲突。而乌克兰危机对于美日同盟“轴心化”的促推作用不仅体现在日本的社会心理上,还体现在日本与美国的大西洋盟伴—北约之间关系的强化上。由于欧洲方面对于来自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的支持需求上升,北约与日本、韩国的军事安全合作随之加强,使得日本扮演北约与亚太间“枢纽”角色的欲望膨胀。美国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两个盟伴体系间的联结加强,更加凸显美日同盟在其中的核心位置。

除了国际环境的变化,美日两国政府和媒体的舆论塑造也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日本国内对于台海局势所表现出的异常“紧迫感”就源自美国与日本保守政治家之间的一唱一和。2021年3月,美国时任“印太军”司令戴维森在国会听证中表示,2027年前发生台海危机的可能性大增,此后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又称大陆“入侵台湾”可能比预想更早,^③此事在日本引起广泛关注。随后,麻生、安倍等日本保守政治家开始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加上2022年8月佩洛西窜台挑起事端,台海局势升温,日本国内舆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进一步上升。10月,布林肯又称“中国已经决定以更快的步伐追求统一”,继续在日本引起紧张气氛。在钓鱼岛问题上也同样如

① 「ウクライナ情勢、9割弱関心ある 報道に厳しい見方も」47NEWS(よんななニュース):47都道府県52参加新聞社と共同通信のニュース・情報・速報を束ねた総合サイト。

② 「『自衛隊・防衛問題に関する世論調査』の概要」、日本内阁府网站、2023年3月、<https://survey.gov-online.go.jp/r04/r04-bouei/gairyaku.pdf>。

③ 《又不是6年了?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也来渲染:大陆“入侵台湾”可能比预想早》,环球网,2021年3月24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42Qx5juHcjg>。

此,近年来日本媒体不断“披露”政府渠道消息,不顾中日双方存在争议的事实,反复将中国海警巡航描述为“侵入”,称中国方面“单方面以实力改变现状”。事实上,是日本在2010年以内阁决议形式否认中日间早在建交时达成的搁置争议共识,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承认争议,并于2012年单方面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导致两国争端升温。然而这些事实被日本媒体的“中国威胁”报道掩盖,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进一步偏离正常轨道,以致对政府文件中把中国定义为地区安全“挑战”等也鲜少反对。

三、美日同盟“轴心化”的影响

美日强化军事一体化,并在亚太地区编织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盟友体系网络,不仅带来美日两国关系、同盟功能等的调整,也使得日本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和作用出现显著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美日同盟的上述“轴心化”趋势,将对地区形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对中日关系带来新变数。

(一)“轴心化”引起美日同盟的嬗变。美日同盟本是二战后美国对日本事实上单独占领的结果,但在冷战背景下已成为美国控制东亚局势的战略工具,并且一直延续到冷战后,成为东亚地区长期存在冷战遗迹的重要表征。在美日共同构建的话语体系里,美日同盟存在的意义是保卫日本的安全,而美国在日本驻军则是日本需要付出的安全成本。随着战略重心转移到遏制中国,美国希望地区最大的盟友日本发挥更大作用,而这使得美日同盟超出了“保卫日本安全”这一传统的同盟定位,而是通过军事一体化,形成更为强大的所谓“威慑力”,并借以控制地区局势。而日本也希望借助在东亚推动“新冷战”格局谋求“转败为胜”,这使得美日两国在新的战略坐标上找到共同利益结合点,从而推动美日同盟朝着干预地区局势、遏制中国的方向发展。

对于美国而言,以军事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同盟“升级”,不仅意味着

将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利益进一步捆绑,使得美国在日本驻军的永久化,更意味着美日同盟的美韩化,即美国掌握军力日益增长的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权,使得日本自身的军事力量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要。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在亚太地区可运用的军事资源将得到显著提升,所谓的“威慑力”也将明显增强。不仅如此,以美日同盟为“轴心”,强化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等多边安全合作,将使美国在地区的可利用资源进一步整合,形成多点控局的态势,进而维护美国的地区霸权。因此,美国通过强化并“升级”美日同盟以控制地区局势的同盟工具性再次凸显,美日同盟对于美国维护霸权的功能甚至超过了冷战时期。

对于日本而言,美日实施军事一体化实际上是对日本现行宪法所规定的“不保持战力”、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的严重违背,这是冷战结束以来日本逐步突破自身所主张的“专守防卫”原则,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进程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借助美国新的战略需求,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体制”对其军力发展的限制。这完全逆转了一度将美日同盟视为限制日本军事力量发展的工具这一“瓶盖论”。美日同盟对于日本的意义,也已经超出“保卫日本安全”的需求,而更多是服务美国的战略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卷入美国参与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幅上升,而这样显然会将日本置于更不安全的境地。由此看来,将美日同盟对于日本的价值限定于“确保安全”已经在逻辑上出现自相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就成为日本强化美日同盟的新需求。在美日同盟“轴心化”过程中,日本将更多地与美国的域内外盟友进行所谓安全合作,例如参与美韩多领域演习,未来参与美英军演等,这使得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而这可以被日本解释为“发挥了更大的国际作用”。同时,由于特朗普重视双边而不是多边的一贯做法,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日本可能在粘合美国盟友体系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二) 日本的国家走向和对外政策将更受限制。从战后历史来看,日本

国内舆论一直是牵制、影响日本国家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随着和平主义思潮式微，追求实力的现实主义逐渐在日本政策圈和战略界占据主导地位。强化美日同盟、分享美国霸权红利这一现实主义战略选择，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认同。前述日本内阁府关于防卫政策的舆论调查结果即印证了这一点。日益认可美日同盟的社会舆论氛围，使得日本发展进攻性武力、强化美日同盟军事一体化等系列安全政策重大突破所受舆论牵制越来越少。而且，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国内已逐渐形成一套同时强化日本军力和美日同盟的话语体系和叙事逻辑。过去用于总结战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重经济、轻军事”的所谓“吉田路线”已经失去解释力，强化自身军力和美日同盟，增强外交和安全的国际影响力，正成为日本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战略选择。

在对外政策方面，美日同盟作为日本对外政策“基轴”这一定位将更为明确，以美国其他盟友为主要对象的“美日+”外交重点将更加突出。在2024年10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在竞选纲领中，仍然强调要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强化与澳大利亚、韩国、东盟、印度、欧洲等共享普世价值观的伙伴间的关系。^①新任首相石破茂在11月29日的施政演说中表示，“美日安保体制是我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基轴”，日本将进一步“提升”美日同盟。^②虽然美国的盟国普遍担忧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会增加美国与盟国关系的不确定性，但从日本过去的做法来看，日本将尽力维护和强化与美关系，以减少美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并且在一些关系日本重大利益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努力说服美国方面延续介入政策，甚至在美国有可能后退或者兴趣减弱的问题上主动“填补空白”，再次上演类似第一次特朗普政权时期

① 「自民党令和6年政権公約」、日本自民党网站、2024年10月、https://storage2.jimin.jp/pdf/pamphlet/202410_manifest.pdf。

② 「第二百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石破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24年11月29日、(日)首相官邸网站 <https://www.kantei.go.jp/jp/103/statement/2024/1129shoshinhyomei.html>。

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承担起《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领头羊”作用的“剧本”。但日本单方面的努力未必能够奏效,而一味追求强化美日同盟将缩小日本的外交回旋余地,使其更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三) 地区和平稳定与合作发展遭遇新挑战。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相对和平与稳定,这为地区经济繁荣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地区热点问题时有紧张,但局势总体平稳,地区合作也得以逐步展开。美日强化军事一体化的出发点是对抗与威慑,而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体系旨在构建排他性小集团,对特定国家实施遏制和围堵,这很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美日同盟“轴心化”将使亚太地区朝着割裂与对抗方向发展,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将随之上升。

首先是热点问题可能进一步升温。在日本强化军力建设、美日军事一体化加强背景下,美日同盟成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得到进一步整合、加强,对外展现出更强的对抗性和攻击性,这将加剧地区力量的不均衡,刺激军备竞赛和热点升温。例如在东北亚这一冷战问题遗留最严重的地区,朝鲜半岛的南北对立势必因美日韩军事安全合作的加强而进一步恶化。在此背景下,原本就处于力量对比劣势的朝鲜选择与俄罗斯加强合作,半岛对抗进一步加剧,朝核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此外,由于美日强化同盟遏制中国的指向更加明确,南海等热点问题上的域外因素更趋复杂,可能加剧紧张形势,不利地区问题的解决与区域的和平稳定。

其次是地区经济合作遭遇新挑战。美国试图在整合其盟友体系过程中,将安全问题与经济相融合,以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这将对地区经济合作造成负面影响。东亚各国地理接近,人文相通,经济相互依存度高,互补性强,近年来区域内经贸合作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实施,促进了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其中中日韩合作

是重要推动力。但由于美国对华实施经济打压、遏制政策，并利用与日本、韩国等的同盟关系，要求后者强化所谓经济安全政策，加入其经济上遏制中国的行列。在美日同盟“轴心化”背景下，以美日为核心的多个小多边机制都更多引入“经济安全”议题，对地区自由贸易、产业链、供应链等自主发展带来新障碍。例如，近年来不断强化的美日韩三边合作中就包含“经济安全”对话机制。2024年11月15日发表的《美日韩首脑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要继续三国在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并承诺创设促进下一代重要新兴技术合作的新框架。^①

再次是中日关系增添新变数。美日同盟“轴心化”将损害中日战略互信，影响中日双边关系稳定。由于美日同盟“轴心化”具有遏制中国的战略指向，其实施过程将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和外交环境带来新挑战。当前中日关系的发展主要基于两国建交以来签署的4个重要政治文件，其确立“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原则和方向，构成了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日本与美国共同推动美日同盟“轴心化”，将“国际安全环境恶化”作为前提和推动理由，实际是将中国视为遏制对象，这有违中日间确立的政治原则，将动摇中日关系的互信基础。同时，日本发展进攻性武力及美日军事一体化等，使得日本完全背离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道路，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利益，这也必将对中国的日本认知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增加中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作为地区大国，中日两国之间互不信任的加剧，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也将对地区合作与繁荣产生消极影响。■

（责任编辑：吴兴佐）

^① 「日米韓首脳共同声明」、日本外務省网站、2024年11月1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754585.pdf>。